

1920年代:现代作家笔下的“父性”书写

宋宇^a, 马德生^b

(a. 河北大学 研究生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b.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五四是反抗“父权”的精神弑父时代,新文学对“父性”的探索成为五四时期独特而又必然出现的文学现象。通过凸显1920年代现代作家笔下从“审父”与“丑父”到“寻父”与“恋父”的演变历程,进而探究了1920年代“父性书写”背后的历史真相——“叛逆之子”与“不肖之女”的共同成长。

关键词:五四;父性书写;寻父;成长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76-04

五四时代是一个思想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演绎着中华民族新旧文化的冲突和传统道德观念的裂变。“父权”作为残旧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整体代指成为了新文化先驱们的反抗对象,而“少年中国”的新生一代对“父权”的否定,不啻是文化和观念领域的“一场象征性弑父行为”。^{[1](P3)}这种象征性的弑父行为可以解释为一种新旧文化的冲突——“新兴的‘子’的文化对维系了两千年的‘崇父’文化的彻底反叛乃至彻底罢免。”^{[1](P3)}五四时代也因此成为了反抗“父辈文化”的精神弑父时代。然而,新文学对“父性”的书写却并不是一“弑”到底,父亲形象的丑恶嘴脸也不是从始到终。相反,1920年代现代作家笔下的“父性”书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反封建的“子辈同盟”的“审父”与“丑父”,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女性作家的“寻父”与“恋父”,使得“封建之恶父”和“现代之善父”作为多元化的精神能指先后出现并共同存在于1920年代的新文学史中。而随着对推动这场“父性书写”演变历程的源动力的探索,被遮蔽的另一重历史跃然纸上,呈现为“弑父一代”在“寻父”历程中的共同成长。

一、“弑父时代”的“恶父书写”

五四是反抗父权的精神弑父时代。子辈“弑父”同盟的发动之举无疑是对“父”文化的揭露与批判,具体到文学领域,即一种对“父亲形象”的塑造,一种对作为“旧文化,旧道德”载体的“恶父形象”的书写。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五四时代的文学现象,在众多的现代作家笔下,这种五四时代之初的“恶父书写”呈现为一种主旨的雷同和方式的各异。

(一)“逆父”:“子辈”的共同夙愿

“新文化先驱们旨在废弃的是文化领域的‘帝制’,是那个历来不可触动的、超越一切肉身之父的封建‘理想之父’:他的礼法、他的人伦、他的道德规范乃至他的话语——构成父权形象的一切象征。”^{[1](P4)}从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中作为腐朽的封建思想的卫道士——“狂人”的“兄长”,到冰心笔下的《斯人独憔悴》中僵化的封建政权的捍卫者——“颖铭、颖石兄弟”的军官父辈;从田汉笔下的《获虎之夜》中滥施父权“扼杀人情、草芥人命”的愚昧之父,到庐隐笔下的《父亲》中滥用夫权“荒淫无度、不忠不孝”的丑恶之夫。无论是“否定父权、审判历史”的叛逆之子,还是“走出闺阁,与子携手”的不肖之女,他们“所弑之父”均是“精神逼仄、阴冷、专制的封建之父”^{[2](P159)},是“封建礼教,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的精神载体和形象能指。由此可见,对“恶父形象”的塑造是“子辈”同盟“逆父”的一种手段,旨在为民主观念的推行和自由思想的传播呈现一种实体化的障碍,让“弑父一代”的“叛逆之举”有的放矢。

(二)“性别”:书写的不同立场

当然,在对共同的“弑父立场”呈现过程中,不同作家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性别立场作出相异的处理,表现为一种“父亲形象”的多元呈现。男作家处理的较为激进,他们笔下的“父亲形象”直接代指了“象征

收稿日期:2013-05-17

作者简介:宋宇(1987-),男,河北保定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思潮研究;马德生(1963-),男,河北丰润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着家国同构的封建政体与封建伦理制度”^{[2](P150)},体现为一种“新旧思想交战中面对面的短兵相接”^{[2](P150)};部分女作家则处理较为缓和,呈现为一种父亲形象的缺席和潜隐,甚至会有慈父形象的个例呈现,如冰心的《海上》等。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源于一种叛逆之子和不肖之女在走入“弑父时代”的不同姿态,一种表现为较为明确的“取父代之”的否定姿态,一种则是较为迷茫的对包括“父权、夫权”在内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审视姿态。前者旨在对历史的“否定”进而“重写”,后者则多了一份对自我处境及其成长环境的观望和寻找。毕竟在“前弑父时代”,作为“弑父时代”的“逆子”同样作为一种“男权文化”的载体封锁着女性解放之路。这种对于“同盟者”的怀疑直接表现为对“共同敌人”的纵容,甚至是依赖。正如研究者指出:“慈父形象”的出现固然与女作家个人生活经历有关,但也隐含着一种与青春心态有关的建构理想父爱、寻找理想父爱的女性书写。^{[2](P151)}这种“慈父形象”作为一种在五四时代的“恶父书写”个例,将女性作家对“弑父之举”的“缓和”处理方式极端化,进而也潜隐地预示了以丁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作家”“恋父历程”的出现。

二、“恋父情结”下的“仁父”重构

1920年代中后期,以丁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性作家”,一反“子辈同盟”的“丑父、审父、弑父”的书写模式,再反“同性前辈”——“父亲的女儿们”^{[1](P14)}对父亲形象“缺席与潜隐”的“缓和化”处理方式,直接把一个“仁慈、仁爱、仁义”的“仁父形象”搬上文学的舞台。通过对这种“善良、慈爱、睿智、刚毅的理想之父”的塑造完成了“恋父情结”下的“仁父”重构。笔者认为:这种“恋父情结”是一种第二代女性作家对“异性长者”特有的“依附与需求”,是一种“失去意识形态的庇护,失去同道和同盟而陷入孤独”^{[1](P105)}的女性对慈爱的渴求,更是面对“都市文化那种纯肉感的社会风气”^{[1](P108)}的困惑女性对正义的呼唤。然而这种“慈爱和正义”被幻化为一种“仁父形象”所施予的“仁爱和仁义”,呵护着“孤独之女”走出这“来自环境和内心无意识的双重黑暗”,^{[1](P110~111)}监护着“情窦初开”的“困惑之女”走向女性性别意识的成熟。在某种意义上这场“父之恋”成为了现代文学的第二代女性作家走出困境的思想指南,“成为1927—1929年间反封建的子辈同盟精神解体后女儿们脆弱而敏感的心灵寻找成长‘力度’的精神之源”^{[2](P152)}。

(一)“精神需求”与“个性传承”的双重构父

在某种意义上,作家丁玲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可以算作是现代文学史中“仁父书写”的最佳范本。部分研究者把丁玲笔下的父亲形象归结

为一种“爱与力”的象征^{[2](P159)}。笔者认为:“爱”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对“仁爱之父”的精神需求,而“力”可以视作是对“仁义之父”的个性传承。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理出丁玲笔下“理想之父”的重构模式——一种表述女性主人公“精神需求”的“自我陈述”和凸显她们对“野性力量”个性传承的“自我展示”的平行推进。

丁玲的作品被研究界定义为“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3](P172)},可见其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往往可以间接甚至直接表现作者的心理欲求,而作者本人也正是通过这种主人公的“自我陈述”——语言和心理的自述来完成对“慈爱与善良”的“仁爱之父”的重构。与此同时,作者用女性主人公的“自我展示”——人格与个性的凸显,印证了“‘父性乡土’的生命野性”^{[2](P160)}对其内在的影响,挖掘潜隐于文本中“父亲形象”的“睿智与刚毅”,完成了作为“仁义之父”的重新书写。

(二)“审父立场”与“恋父情结”下的另一种声音

除了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石评梅的《红鬃马》《白云庵》《流浪者之歌》《董二嫂》也都用“自我陈述”和“自我展示”的方式完成了对“仁父形象”的重塑,“他们迥然不同于传统纲常中的严父或冷酷父亲形象,是身心疲惫的五四女儿所需要的那种慈祥、体恤、睿智、英武等情感与精神智慧为一身的理想之父。”^{[2](P192)}于是我们发现,以丁玲、石评梅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五四落潮以后的1920年代中后期与“所恋之父”悄悄结成了“父女同盟”,踏上了“寻父之路”。与此同时,男性作家仍然在继续着以“否定历史与审视父权”为目的的“恶父书写”,对“‘父亲’进行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正面的、彻底的历史清算”^{[2](P162)}。

然而,正如在“弑父时代”反封建的子辈同盟共同掀起的“丑父”洪流中会出现另一条分支——部分女作家笔下父亲形象的缺席和潜隐,甚至会有慈父形象的个例呈现,那么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男性作家在进行“恶父”的续写中也出现了些许的改变,或者部分文本存在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比如曹禺的《雷雨》^[4]中“恶父”代表周朴园,这个专制刻薄、自私虚伪的资本家形象背后却有一段忘年的恋情,而这恋情的记忆似乎可以定格在“旧时”的家具、绣着“萍”字的衬衫,还有那间“从不开窗”的屋子。一个谎言说上千遍就不再是谎言,而这“虚伪”坚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认可为是“诚恳”的忏悔。照此说来,曹禺笔下的“恶父形象”呈现了“人”的影子。还有茅盾的小说《虹》中的与女“同盟”、掩护梅行素出逃夫家的梅父,朱自清眼中那寄托着深沉父爱的“背影”,都可认为是男性作家笔下“恶父书写”的另一种声音。而这些男性作家对“父亲形象”的“人性”添

加,可以作为“恋父情节”下的“仁父重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是应该把重构的“仁父”更准确为“人父”。

三、“寻父历程”中的“共同成长”

19世纪20年代是现代文学对“父性”探索的时代,从“子辈同盟”的“恶父书写”,到“第二代女性作家”的“仁父重构”,“精神逼仄、阴冷、专制的封建之父”与“思想通达、睿智、英武的现代之父”先后出现并共同存在于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女性作家从“弑父”到“恋父”的巨大转变,还是男性作家对“审父”与“丑父”的一如既往,笔者统一认定为五四儿女们的“寻父”历程——前者是寻父之“善”,后者是寻父之“恶”。然而探究现代作家笔下“父性”转变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一种五四先驱们的“共同成长”——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男性作家批判精神的成熟。

(一)寻父之“善”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意识包括社会、自然、文化三个不同的层面。综合近现代中国女性作为反抗阶级压迫的主体姿态、对生理属性的自我研究状况和“男权意识形态”背景下的“边缘文化”处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最初阶段主要表现为对男权的反叛,首先是对父权和夫权的反叛。”^{[5](P41)}这也就是五四之初,“不肖之女”可以与逆子结盟的根源所在,并体现为1920年代初庐隐等女性作家对“父亲形象”的丑化与批判。然而这种“第一代女性作家”的“觉醒”是一种碍于压迫的反抗,反映为“逆女们”迎合五四时期“弑父”潮流的盲动与“现代女性”的“集体无意识”^{[6](P173)}。

根据部分研究者对女性成长标志的界定——“一是女性肉体的觉醒、女性欲望的觉醒;二是对男性中心世界的深刻怀疑、对自由恋爱结局的婚姻品质的重新审视,”^{[2](P185)}莎菲才是中国女性最具代表性的成长标志;^{[2](P192)}如果按照“性别的觉醒”作为我们区分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代和第二代女作家的一种标准,^{[1](P107)}丁玲才是“第二代女性作家”的“领头羊”。透过莎菲的心理欲求和丁玲的《在黑暗中》的创作动机,我们便揭开了“第二代女儿”的“寻父”之谜。

首先,“寻父”是“现代女性”自我存在的前提。谈到自己最初的创作动机,丁玲曾说是“因为寂寞”^{[7](P15)}。这种“寂寞”可以理解为深处现代都市的色相文化与“异化”危机的“孤独”处境,一种盟友的缺失和“文化——话语”领域不搭界的“自语状态”^{[1](P117)}。而这种“寂寞”在她以生命感受的表达与宣泄为创作宗旨的早期创作中得到满足,体现为对“盟友”的呼唤和对“慈爱”的渴求。正如丁玲《在黑暗

中》跋》中的自述:“但为了给他给我写这书的动机和勇气,我愿做为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频的心上,是奢望着要盘踞一个地位的。”“末了,我要向一些曾勉励我而且希望着我的先生们,女士们,尤其是我的母亲致谢。为了这些好心,纵是自己毫不能自信,也要努力下去的。”^{[8](P3)}然而,以“爱情同盟”的代表胡也频和“亲情同盟”的代表母亲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却在《在黑暗中》的四部小说中不曾出现。而是以一个“仁慈、仁义、仁爱”的父亲形象将丁玲的两种诉求合二为一。于是这个“仁父形象”便可以理解为丁玲走出“黑暗”的“领路人”和“现代女性”在“黑暗”中生存的“避难所”。

其次,“寻父”是“现代女性”自我认可的标准。“从心理学层面上说,从‘女儿’到‘女人’的女性成长,通过以‘父亲’为性别参照对象的俄狄浦斯情结,确立其性别意识和性别自我。”^{[2](P160)}笔者认为:这种“现代女性”对“父亲”的“参照”,实际上就是“第二代女性作家”在对“父辈长者”生命个性的模仿过程中的“扬弃”——体现为对“生命野性”的传承和对“社会母性”的摒弃。正如有些研究者对莎菲心理欲求的探析:“她不喜欢软绵绵的男性,她需要一种能征服自己的强力,又需要异性对自己的真正理解,需要两性之间精神上的沟通。”^{[9](P199)}这种“强力”源于“父性乡土”的生命野性所演化的“睿智与英武”,她是“现代女性”的狂狷气息与反抗意识的精神之源。而对异性的“真正理解”的索取,则意味着“对男性中心世界的深刻怀疑、对自由恋爱结局的婚姻品质的重新审视,”^{[2](P185)}这一“自觉”契合了女性成长的第二个标志,体现了一种“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的凸显。而所谓“社会母性”则是“人类所应当厌弃的那种浸透于我们思想意识中传统化了的”“社会化了”的“母性,”^{[6](P102)}。同样,正是由于以“慈爱”为标榜的“自然母性”与“卑微和丑陋”的“社会母性”相互纠缠着并存于“母亲形象”中,所以“第二代女性作家”只能以“父亲形象”为“参照”,进而完成对“社会母性”的彻底抛弃。

(二)寻父之“恶”与批判意识的成熟

如果说女性作家的寻父之“善”,是一种“自我存在”与“自我认可”的需要,那么男性作家的寻父之“恶”则是历史所赋予的“革命任务”使然。只不过较于1920年代中后期短暂而仓促的“第二代女性作家”的“父之恋”现象,他们的“寻父”历程进行的较为缓慢而持久,并且遮蔽在自始至终的“弑父”大潮中。

男性作家的“弑父”言说一直是1920年代的“官方话语”,代表着五四时代先进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1927年新的政治局面促使“叛逆子女们”的“弑父之举”做了一个维度的调整——从精神维度具体为政治维度,蒋介石集团作为“‘政父’结构本身”^{[1](P97)}

代替了五四之初所批判与否定的“封建之父”。如果说,家长与逆子、父辈与子辈的亲子矛盾构成了五四文学中的对抗性冲突,那么,左右新文化第二个十年的却是一场不分辈分、不干亲情的政父与政子、或曰权势者与被剥夺权势者们的冲突^{[1](P98)}。

然而,这种维度的调整与冲突主体的改变只是一种外在形态化的政局更替,并未从根本改变男性作家的“弑父”宗旨。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1928年的“文艺论战”,再到1931年的“左联”成立,五四先驱们所战之敌始终是封建的遗毒,所论之题仍然是“人”的发现和个体意识的觉醒。正如研究者指出:在一个已经被历史地规定的孤独者、子民或奴隶位置上,有一批知识分子接续并延伸了五四的价值传统,他们坚持寻求反封建及人性的解放之途。^{[1](P98)}正如在提到“五四中后期男性作家群对‘父亲’进行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正面的、彻底的历史清算”这一历史趋势时,笔者曾指出:部分男性作家(茅盾、朱自清)的“父亲形象”的“人性”书写和部分作品(《雷雨》)的另一重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第二代女性作家”的“恋父情节”下的“仁父重构”,并强调这些男作家的重构之父是“人父”——富有人性光辉的血肉之父,而不是妖魔化的“符号之父”。因此,作为一种中间的过渡,这些男性作家完成了对“父性”作为“精神载体”的抛弃,转而直接发难于新政父——新的封建政体与统治机制,而他们

作品中“人、个性”的价值与美感始终没有被泯灭。

由此可见,这种男性作家对“父亲”的“人性”的“追溯”与对“父权”本质的探索是同步进行的。在这漫长的“寻父历程”中,男性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经历了五四初期的“工具化”、1928年文艺论战前后的“人性化”还有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化”。而作为“弑父”的“主体”,五四逆子们则随着“批判意识”的成熟,从年少轻狂的叛逆,经过文艺论战的思索,逐渐走向更为实际的战斗。这种“批判意识的成熟”既是逆子们“寻父之恶”的同行者,也是作品中“父性”演变的催化剂。

综上所述,“寻父”历程背后的历史是子辈同盟的成长史,更是他们对“父性”善恶的编纂史。“父亲形象”作为不能言说的“他者”配合着“弑父一代”完成了对自己的书写。“他们”在帝制的残骸中孕育了叛逆的儿女,又在五四时代的大潮翻滚下度化这些儿女走向成熟。整整十年间,“他们”从缺席潜隐走向光芒四射,从封建腐尸变成生命之源。“他们”有着对罪恶的承受,也有着对光明的领航;有着“逆子”投来的弑父之恨,也有着“逆女”寄予的恋父之爱。五四儿女们正是在对“父亲”的“爱恨交织”下匆匆走过了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走过了轰轰烈烈的“弑父时代”,而1920年代的“父性”书写也在子辈同伴对“父”的“依恋”中隐匿于更为壮阔的革命年代。

参考文献:

-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2] 常彬.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 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3] (日)中岛碧.丁玲论[A].丁玲研究在国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4] 曹禺.曹禺代表作(上)·雷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 [5] 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A].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

文学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 [6]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7]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A].张炯.丁玲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8] 丁玲.《在黑暗中》跋[A].张炯.丁玲全集·第九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9] 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The fatherhood under the pens of the modern writers in the 1920s

SONG Yu^a, MA De-sheng^b

(a. Graduate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b. School of Chines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 May 4th sees the resistance of paternity, which is reflected in literature by a unique intermingling of denouncing, derogating, looking for and loving of paternity in the 1920s.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fatherhood writings of the 1920s in order to seek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co-occurrence of rebellious sons and unfilial daughters.

Key words: May 4th; fatherhood writing; seeking paternity; growth

[责任编辑 李 靖]